

国际教育组织及其对 国家教育发展的影响论析

杨启光

(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国际教育组织所扮演的角色与功能日益重要,许多国家的教育政策深受其影响。研究国际教育组织与国家教育发展的相互关系,借助国际教育组织来维护和扩展国家教育利益,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是摆在每一个主权国家面前的紧迫课题。在国际教育组织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活动范畴、活动内容与行为方式,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不同国家教育的规划与行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开始了和国际教育组织的交往与合作。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需要日益发展的中国在全球教育体系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为此中国必须重新改造与丰富同国际教育组织的关系,以此来适应日益密切的全球教育相互依赖的关系。

关键词:国际教育;国际教育组织;国家教育发展;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6-0054-07

一、国际教育组织的发展

研究国际问题的国内外学者称,21世纪是国际组织的世纪。国际组织目前是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术语,已经确立了其在国际关系中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地位。因此,关于国际组织的理论研究比较丰富,吸引了包括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与历史学等学科的参与。以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学派认为,国际组织是以“理性”和“道德”为基础的一种超国家的机构和组织,目的是加强国际合作与维护世界和平。以卡尔(E. H. Carr)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则认为权力是国际组织的目的,其本质是一种权力工具,它关注的是人类的高级政治事务。还有一种比较新颖的认识,是“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认为国际组织是“许多不同层次之间联系的网络、规则和机构”。西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派认为国际组织是价值和规范的一种载体。^[1]不同流派的定义,拓宽了对国际组织的理解视野,体现了国际组织具有的一般特征,即国际组织是国际交往与国际合作的高级形式,是实现成员国的利益的重要权力工具,是具备相对稳定的价值、规范与组织形式的重要行为主体。以此来看,与教育相关的国际组织,作为一种专门性的国际组织,是以国际教育合作为主要形式,依靠成员间的双边或多边的合作活动来谋求符合成员国共同教育利益的重要的教育组织、规范、协调与援助的行为主体。

国际教育组织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存在、形式的变更、组织机构的完善与地域的扩大,都有序

* 收稿日期:2012-03-18

作者简介:杨启光,教育学博士,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教育政策转移研究”(10YJC880142),项目负责人:杨启光。

地展现了国际教育组织发展的内在逻辑。关于教育相关的国际组织的思想渊源,最早必须提及的人物是“比较教育学之父”朱利安(Jullien,M)。他在1817年出版的《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一书中,体现了他的和平教育主张。他提出设立国际教育组织,希望通过该平台让各个国家相互交换教育资料,加强教育的国际交流合作,以促进世界和平。遗憾的是,由于朱利安所处的时代正值民族主义思潮盛行的时期,这与他提议的加强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思想格格不入,法国对他提出的一系列比较教育设想缺乏必要的热情。^[2]因此,建立国际教育组织的想法被长期束之高阁。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由于国家之间的联系增多,一些以专门性、技术性的区域性国际组织逐步建立。当时的欧洲普及义务教育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一些区域性国际组织开始关注儿童生存、儿童权利、儿童中心主义的教学、高等教育中青年学生的国际主义以及教师的权利等教育议题,许多国际性的博览会成为传递这些教育论题的重要场所。后来,一些人士和学者开始积极筹建国际组织。1901年,美国女性法学家安德鲁斯(F. F. Andrews)倡议成立国际组织,以促进各国交换教育资料,增进国家间的互信与友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成立了重要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1921年,国际联盟中设立了“国际智慧合作委员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表明了人类渴望和平,加强国际教育合作的愿望。该委员会主要是负责促进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出版学术刊物、储备科学研究的国际基金、协定与处理国际专利与著作权等事务。因此,有学者认为“国际智慧合作委员会”可以视为日后国际组织的前驱^[3]。必须指出的是,一些非政府组织,如国际妇女组织、国际教师联盟积极推动“国际智慧合作委员会”的设立,并继续促进后来许多重要国际组织的产生和发展。

“二战”以后,国际组织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起来。教育作为人人享有的基本权利,不仅能够帮助弱势群体,而且能够在不同的种族和文化群体之间建立共同理解,切合当时世界历史发展需求。大量的国际组织与专门国际组织开始介入各国教育开发与国际教育合作,开始日益显示它的独特的重要作用,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重视。19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国际组织发生巨大变化,全球化与区域主义思潮席卷全球,全球公民意识不断成长。关乎人类发展的教育问题逐渐成为国际组织重视的主要领域之一。通过多层次的教育合作、交流与竞争,进一步要求相关国际组织发挥独特的角色,通过教育领域的一些国际组织的推动,跨越国家疆界的教育合作与交流逐渐成为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主题。

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国际组织已经多达数百个。按照国际教育组织的主体构成,可以划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这种分类直接关系到国际组织对国家教育发展的影响程度。前者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联盟、美洲国家组织、国际教育局、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后者主要有沃尔多夫教育组织、国际大学协会(IAU)、国际成人教育学会、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IEA)、国际乐施会、教育国际组织(EI)、行动援助组织以及一些国家的基金会等。此外,还有借助网络通讯技术发展形成的地区性网络组织,如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网络(ENQA)、亚太地区高等教育研究网络(APHERN)以及围绕大学国际交流的合作中心与合作论坛等。就目前来看,与教育相关的多边性国际组织主要是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二、国际教育组织的基本活动范畴

由于市场全球化和高科技的推动,加之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成为世界全球化重要的动因,这些动因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全球化的问题,如和平问题、环境问题、发展问题、民族之间的隔阂问题等,凸显了国际教育合作的意义。国家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显与紧迫。全球化趋势客观上要求加强国际合作、妥协和协调,这为国际组织提供了大展身手的广阔舞台。

从教育具体领域来看,各个国家也存在许多共同的潜在教育问题,如教学过程、师资培养和报酬、终身学习、教育的标准、生产力和就业、科学研究和公民职责、社会融合、经济发展、教育结构改革、大学的作用、成人扫盲、教学语言和教育研究。这些问题的解决,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大量相关信息,需要变革的措施,需要从别国借鉴有益、有创见的思想。正如世界银行人力资源与社会政策部的欧洲与中亚教育专家史蒂芬·海内曼所言的那样,“教育目的具有普遍性不是国际阴谋,也不是帝国主义或者例证决定主义的表现。它只是世界教育的一个事实。”^[4]因此,加强国际教育合作,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是出于国家利益,是将教育置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地位的必然选择。国际组织主要通过下面几种活动,来影响国家教育的规划与行为。

(一)传播全球教育价值与规范

从国际组织的形成发展来看,都是基于对世界和平的终极期盼,希望通过一个载体来向全球传播共同的教育价值与规范。因此,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重要的活动就是希望让各个成员拥有共同的教育价值观念和共同教育话语而聚集起来,来决定彼此的教育观念架构,最终通过其它合适的途径,来重新塑造或改变其它行为者的教育行为。全球人类面临的共同教育问题,为国际组织传播共同的全球教育价值与规范提供了可能。从二战结束以来,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紧紧围绕“人是目的”这个现代性核心,重视人的基本的教育权,开展了系列大会,发表诸多重要宣言,形成了许多重要文件,向各个国家共同传播了“平等、公正、发展、团结”等重要观念。在教育价值取向上,国际组织始终以国际理解与和平,消除国家、民族和种族的对立、隔阂和冷漠,反对暴力和战争为总的价值取向。^[5]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组织的不断成熟,全球社会正在强化一种全球共同的伦理,它体现了国际组织的自然法则意识。自然法则观认为,组织法则必须从人的普遍性为出发点,要求道德之善与人的理性要一致。国际组织反映了人类寻求至善的理想追求,在解决人类教育问题的同时,又通过教育来加强国家、人民与个体之间的理解协作,推动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

(二)研究全球教育制度与问题

作为国际组织的重要活动,就是通过组织强大的政策优势与人力、资金资源,积极开展专门的教育政策和教育计划的研究,依靠一定渠道来影响国家的教育发展政策。其中,发展教育是国际组织研究的重要教育问题,包括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辅助机构,如国际教育局、国际教育规划局,积极参与“二战”以来一系列国家教育重建,在许多国家或地区推行教育现代化建设,在不同时期形成了考克斯(Cox. R. W)提出的不同的“教育发展意识形态”。^[6]如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组织主张发展基础教育,实行农村扩展培训、农村成人扫盲与普及初级教育等政策;20世纪60年代,积极宣传人力资本理论,强调大力开展正规中等和高等学校教育,实行职业倾向的扫盲政策;20世纪70年代,国际组织突出教育的机会均等理念,要求各国广泛重视青年和成年人的非正规教育,提出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20世纪80年代,要求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和提高教育效率,加强国家教育行政与财政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满足个体基本的学习需要成为各个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国际组织强调发展中国家要普及义务教育,推行全民教育,大力提高教育质量。

国际组织通过学术研究与质量评估来影响国家教育发展方面,最近以来主要以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IEA)组织的活动最为突出。作为重要的非政府教育组织,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开展了一些有相当影响的大规模的国际教育成就研究,在国际科学数学、语言、公民与艺术以及特殊教育领域进行了跨国调查研究。依赖大型的国际组织,获取教育基本的信息资料,将对参与国的教育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开展全球教育援助与开发

全球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与危机,对于人类和平繁荣是一个重要的威胁。国际组织希望通过教育来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最终获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开展全球教育援助与开发成为国际组

织又一重要活动。“二战”以来,国际组织作为主要援助机构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教育援助,其中世界银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外部教育资助的提供者。

冷战以后,国际组织在国际教育开发与援助方面发挥愈加重要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的教育援助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过去单纯的经济发展为中心向人力资源开发方向转变,援助领域也从高等教育转变为满足人类基本教育需求,对初等教育、农村教育、非正规教育与女性教育倾斜。国际组织的教育援助关系从不平等向致力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转变。^[7]国际组织主要通过这些教育资金、人力与技术的援助,来影响各个国家的教育政策,以督促该国解决存在的某方面教育问题。

三、国际教育组织影响国家教育发展的方式

自二战以来,国际组织深刻地影响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发展,它们为全球教育发展提供了普世的人道主义或民主教育,强化了教育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使不同国家追求着相似的教育文化,如义务教育的普及、国家教科层组织、国家课程、妇女就业率的提高、社会科学的课程。^[8]世界各国的教育政策中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教育同态现象(educational isomorphism)。国际组织主要是通过下面几种方式,来影响相关国家制定共同的教育规划与政策。

(一)交流教育信息

国际组织主要通过全球信息网络把成员密切联系起来,是它们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国际组织经常召开大会、会议或工作坊。其中,重要的国际教育大会上形成的教育建议,将通过一定程序传递给与会的政府代表团,再转交各国教育部,以此来搭建交流论坛的平台。其次,通过出版报告、论文与建议书等交流信息。网站、电话、电子邮件、传真以及各个组织的时事通讯、小册子、简报,都可以让国际组织与世界的公众能够理解和利用相关信息。

这种方式最早可以追随到186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的国民教育制度的信息主要通过大会迅速在世界传播扩散,影响其它一些国家的仿效学习。又如1948年世界人权大会确立的教育权、公共教育的价值与义务免费的初等教育原则等,被一些国家写入宪法。1990年3月在泰国宗滴恩召开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极大地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基础教育的改革政策。

(二)签订协议书

国际教育组织同其它国际组织一样,扮演了全球性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的创制者的角色。国际社会没有统一的凌驾于各国之上的立法机构,规范国际关系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条约化、法典化是一定意义上的国际立法形式。而国际法的编纂、国际公约的订立,基本上都是由国际组织来完成的。^[9]国际组织的立法形式主要体现在国际组织的协议书上。任何国家加入该组织必须接受并签订相关条约,这是成为该组织成员的必备条件,以此来规范他们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保障他们应享有的权利。

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法》,确立了“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来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对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以增进对正义、法治及联合国宪章所确认之世界人民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均享人权与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的宗旨。它的性质是国际条约,是对成员有强制约束力的国际统一制度,将直接要求成员国在教育发展规划与措施方面必须遵守该组织确立的基本的价值与标准。

(三)制定教育标准

国际组织除了规范具体组织的组织原则与宗旨外,对于国家教育制度作用有很大影响的是一系列的决定、宣言以及建议书,尽管这些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但是对于各个国家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和教育意义。国际组织通过召开政府与非政府的国际教育会议、签署国际教育有关方面的合约和协定、发布有关国际教育的建议或调查报告,都是国际组织制定统一的教育标准的工具。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规定的“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作为全球恒定的教育标准，对各国政府制定教育发展战略起着标杆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国际教育局，主要工作中的一项是组织召开国际教育大会。从1934年第三届大会以来，每届会议都向各国教育部提出二至三项建议书或宣言，涉及正规初等、中等教育、特殊教育与扫盲教育；一般课程和各专门学科教育；教师教育和教师的聘用、在职教育和教师地位以及教育财政、规划、督导、学校建筑、学校用餐和学校环境等众多教育领域，是“公共教育的国际宪章或规则，一种教育学说”，“是一种有价值的鼓舞和指南的来源”，成为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改革共同指南。^[10]

(四) 提供发展教育的技术与资金

由于国际组织积累了多年丰富的援助经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左右一个国家或地区教育政策走向。一些国家政府积极采纳国际组织的建议，一个很明显的动机就是获得来自国际组织的财政资助与奖励。有研究者专门调查发现，在国家教育发展目标与国际组织标准非常一致的国家里，大部分属于那些刚刚获得民族解放的新兴国家，由于希望尽快褪掉殖民化的色彩，专心建设国家，往往有比较明确的动机接受来自外部的教育模式。而国际组织此时充当了催化剂的作用。^[11]例如，世界银行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外部教育资助的提供者。国际组织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专家”(development experts)，他们往往是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是学术界的国际权威，他们通晓国际教育规范，可以很好地研究受援国或地区政治经济状况，传递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先进做法、建议和意见，来促进该国或地区教育发展。

(五) 指导、监督与实施国际教育准则

国际组织形成的一系列国际教育准则，对于国家政府是否会改变他们在某些教育问题上的立场，是否对该国教育计划与行为产生了影响，是国际组织较为重视的问题。为此，国际组织总是通过创立一种教育政策标准，形成一种共同的教育理念的氛围，同时负责这些制度的实施并通过一定杆杠，指导、游说或监督政府执行规则，来推行趋同化的全球教育制度。

国外一些关注国际制度的学者，对于影响一个国家内部结构选择的因素很感兴趣。他们从具体的个案入手，经过大量实证分析，表明国家外部力量，尤其是国际组织层面在影响国家内部政策选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外学者马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研究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几个国家科学政策的关系，发现在1955年以前，大多数国家没有认识到科学官僚机构符合它们的利益，科学政策尚未成为国家有效功能的组成部分。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和一些杰出的发达国家的例子，说服了其它国家，无论科学、发展、安全的客观环境如何，制定科学政策是国家必须执行的任务。^[12]学者列文(K. Lewin)等，曾对亚非拉16个国家在1966—1985年间国家教育发展计划进行调查，发现这些计划都表达了教育在劳动力发展、社会平等与国家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而这些计划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的教育政策具有很大的—致性，表明了国际组织和国家教育计划存在密切的关联。学者麦克尼利(McNeelyde)等研究了向第39届国际教育大会提交的108份国家教育报告，以此来分析这些国家是否采纳了先前大会的几项政策建议。结果表明，除了个别以前就制定了相关政策的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回应了大会的建议，采取了相应的国家政策行为。^[11]

四、推进中国教育与国际教育组织的协调发展

(一) 国际组织与中国教育的发展状况

由于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and 特殊作用，通过国际组织进行重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参与国际活动能力的重要指标。作为国际组织与中国教育的交往，也同其它国际政治、经济组织一样，经历了比较曲折的过程，总的来讲，时间很短、范围窄、经验少。在教育领域中，中国与国际组织较早开始交往的事件，可以回溯到20世纪20年代晏阳初领导的中国平民教育运动。1925年7月晏阳初以全国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的身份出席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提出

了“平民教育”案,使平民教育运动开始走向世界。1945年11月,成立初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吸收了中国平民教育的经验,主张在世界落后地区推行基本教育。在瞿世英的努力下,中国国民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办了远东基本教育会议。这可以视为我国与国际组织的正式交流合作,借助国际组织舞台,乡村平民教育思想与行为在中国广泛传播。^[13]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特定的外交方针,中国与世界国际组织基本上没有任何交流。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得到恢复,1972年10月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开始了中国与国际组织的重新合作交流,但是限于客观条件,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科学教育交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确立了加快对外交流的政策,逐步开始了全方位与世界国际组织合作,双边、多边政府间组织教育合作项目蓬勃展开,各种非正式国际组织也陆续参与中国教育的援助开发之中。比较显著的应该是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合作交流。与教科文组织开展的活动主要有出席国际教育大会、举办高层次国际教育研讨会、参与“亚太地区教育革新为发展服务计划”(APEID)与全民教育(EFA)计划活动、建立“国际农村教育与研究培训中心”、在华发行教科文组织出版物等。^[14]与世界银行的合作主要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重点共同开发中国高等教育项目。中国于1980年参加世界银行组织,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大量高层次人才,因此高等教育一直处于教育项目的核心位置,涉及到科学与工程、高等农业教育、电讯、财政金融、交通、地质、航空、冶金等众多领域。^[15]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科技高速发展,中国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涉及普遍性与区域性组织,还包括参与一系列民间非政府教育组织的合作,在教育制度、课程教学、教师、学校管理与教育研究等领域开展广泛交流,在改变教育观念、培养教育国际化人才与提高教育硬件设备技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交流中,提升了中国参与国际教育合作交流的视野与能力,在开放合作中增加了中国在国际教育舞台中的地位与作用,推进了中国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从而加速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

(二)中国参与国际教育组织的现实路径

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全球教育发展的必然。教育国际化给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必将极大地改变各国教育的形态。全球化导致人们以往所熟悉的地缘政治边界和经济关系已经被新的现实所取代,经济一体化系统之外的国家将难以生存和发展。因此,游离在教育国际化之外的国家的教育发展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况且,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跨国界的知识传播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遗漏出教育国际化的“网络”。^[16]国际教育制度的建设,必须通过国际组织来形成国际教育的规则、规范与标准,以此来适应日益密切的全球教育问题的相互依赖关系。开展国际教育合作,共享全球教育信息,应对国际教育问题,迫切需要中国依托一定的国际组织,发挥它在国际社会中独特的作用。因此,全球化进程使国际教育制度的设计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要求中国在全球体系中承担更多责任。

但是,凭借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教育现代化水平以及同政治经济领域成熟地融入国际组织的状况相比,中国与国际组织在教育领域的参与活动、学术研究和享有地位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参与国际教育组织数量少,国际组织中地位不高、发挥国际教育影响力小、参与国际组织官员与技术人员少、国际组织相关教学研究薄弱。为了加快中国教育国际化进程,争取并改造和平稳定的国际教育环境,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全球形象,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教育制度、机制和标准的创设过程中去,必须重新改造中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

第一,要加强国际教育组织的学术研究与教学。目前,关于国际组织与国家教育发展的相关问题研究,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关注,原因可能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任总干事松浦晃一郎(Koichiro Matsuura)所说的那样,国际组织“很少能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立即的或引人注目的影响,因此它们很少受到媒体的关注,在公众中的印象也较肤浅。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急促的、

急躁的和即刻的时代——妨碍人们去认识这些组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重要角色。”^[17] 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强了各国教育的彼此联系,教育流动与合作开始超越国家界限,国际组织将在教育国际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国际和比较教育的知识、信息与技术需要通过它来进行扩散。另一方面,了解西方国际组织的理论与方法,有助于中国更加规范地融入国际框架之中。因此,需要更多的人理解国际组织,研究和把握国际组织的性质、运行机制与规律,从而更好地调节国际教育中的一些矛盾与冲突,以便科学合理地指导国际教育的发展。用开放的世界和国际组织资源,来发展中国教育,成就了教育现代化的重大成就,其中比较教育学发挥了信息的传播、创造与国际人才培养的功能。为此,国家必须要特别重视比较教育学的作用,积极开展国际教育组织的学术研究与教学。令人可喜的是,最近由张民选教授完成的学术专著《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首次较系统地分析了国际教育组织,这将有力带动我国在该领域的深入研究与实践。

第二,积极参与国际教育组织活动。近几年以来,中国政府逐渐认识到世界重要国家的影响力需要借国际组织来加以延伸。中国政府各级教育官员与民间力量开始主动融入国际组织,拓展同各种层次、形式的国际组织加强理解合作,除了教育协作的目的,也发挥了整合区域经济与政治力量的效用。2006年6月,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G8+6)教育部长对话会,讨论了国际教育领域关注的前沿、热点和焦点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为了扩大中国的影响,必须与重要的国际组织携手,支持跨国、跨地区的教育援助与开发,在合作中实现互惠与共赢。

第三,建立中国主导的全球性或区域性教育组织。依托中国的国际影响与综合国力,应该组织专门力量,投入必要的经费,创办国际教育专门人才培养项目,加强国际组织的宣传普及,成立一系列由中国主导的全球性或区域性教育组织。在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瑞典、美国、加拿大、英国等都在发展本国经济教育同时,积极设立专门的组织,成立国际开发署介入全球教育事务,进行全球贫穷国家的教育的救援行动。中国在这方面应该有很大的作为,要结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创新发展思路,积极利用国际组织平台,向世界表达中华民族共同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美好愿望。

参考文献:

- [1] 于永达. 国际组织学[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4
- [2] 卢晓中. 比较教育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7-18.
- [3] 钟宜兴. 比较教育的发展与认同[M]. 高雄: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2004:18.
- [4] 史蒂芬·海内曼. 21世纪国际教育合作. 王晓辉,赵中建,等译. 为了21世纪的教育——问题与展望[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55.
- [5] 朱旭东,黄晓红. 国际(教育)组织的价值取向研究[J]. 国际观察,2000(5):49-53.
- [6] Cox R W. Education for Development[J]. In R. N. Gardner&M. F. Millikan (Eds)The Global Partnership: International Agencies & Economic Development,1968:310-331.
- [7] 袁本涛. 发展教育论[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536-635.
- [8] 王惠兰. 全球化话语与教育[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4):90.
- [9] 饶戈平,黄瑶. 论全球化进程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关系[J]. 法学评论,2002(2):3-13.
- [10] 赵中建. 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国际教育大会60年建议书[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2.
- [11] Connie L. Meneely. Prescribing National Educational Policies: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995, 39(4):483-507.
- [12] 马莎·芬尼莫尔. 国际组织是国际准则的指导者,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与科学政策[G]//利萨·马丁,贝思·西蒙斯主编. 黄仁伟,蔡鹏鸿,译. 国际制度.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5-99.
- [13] 兰军. 平民教育与国际组织:加入、促进与融合[G]//第十三届中国比较教育学年会会议论文集.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6:10.
- [14] 田正平,主编. 中外教育交流史[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1066-1068.
- [15] 丁钢. 中国教育的国际研究[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241.
- [16] 吴忠魁. 论国际化时代的教育选择[J]. 比较教育研究,2002(1):21-25.
- [17] 松浦晃一郎. 赵慧译. 明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J]. 全球教育展望,2001(1):72-75.